

·历史与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的军工建设思想述论

仲 华

(南京政治学院 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 江苏南京210003)

摘要: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高度重视军工建设。主张在国家工业的整体发展中统筹军工建设,处理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在国防任务的需求牵引下开展军工建设,处理好应急备战和长期规划的关系;坚持“两条腿走路”,处理好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坚持“以我为主”,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这一系列实事求是、富有实效、独具特色的军工建设思想,发挥了重大的现实指导作用,也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启迪。

关键词: 新中国;周恩来;军工建设

中图分类号: E297.5;E2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774(2013)05-0081-04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高度重视军事工业建设,将军工生产视为人民解放军肩负的两大生产任务之一,将军工近代化视为国防近代化的重要基础^{[1]2}。他始终着眼国家安全发展全局,立足军工建设实际,遵循军工建设规律,谋划、组织和领导军工业,特别是与聂荣臻一起主持“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做出了巨大贡献。在此过程中,周恩来阐述了一系列实事求是、富有实效、独具特色的军工建设思想,为后人提供了有益启迪。

一、在国家工业的整体发展中统筹军工建设,处理好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

新中国工业体系是在战争废墟上从无到有构建起来的。在此过程中,周恩来主张,国家工业发展以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为优先,军工建设与国家工业发展相适应,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互结合,实现国家工业结构的不断优化与工业生产水平的稳步提升。

其一,国家工业发展以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为优先。1951年初,周恩来着手编制“一五”计划,开始构想大规模建设蓝图。经过反复权衡,1952年

7、8月间,他审定《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和《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思路已然清晰。周恩来首先从国家利益的高度考虑问题,指出“我们要进行建设,看不到整体就不行。我们看到了整个国家的建设,看到了整体,也就看到了先后,看到了重点”^{[2]977-978}。当时,尽快改变旧中国重工业极其薄弱、国防科学技术基本空白的落后面貌,是实现经济自主、国防巩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符合国家最大最根本的利益。周恩来同时还有着抓重点带动一般的重要考虑。他指出:“突破尖端,这不仅有利于加速国防现代化,而且能够推动整个工业的发展,带动整个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1]501}这实际上是从工业发展客观规律的角度,阐释了新中国工业发展路径选择的科学性。

其二,军工建设与国家工业发展相适应。周恩来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认识,从来不是单向和孤立的。“一五”计划大方向确定以后,他曾多次提到“要重工业,又要人民”^{[3]230},即优先重工业,但不能忽视与广大人民生活联系紧密的轻工业和农业,各方面尽可能地协调发展。军工建设尤其不宜冒进,而应在国家工业整体发展的基础上获得长远

收稿日期:2013-07-15

作者简介:仲 华,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系副教授。

发展的稳固支撑,是周恩来的一贯认识。早在1950年全军参谋会议上,他就指出,部队生产是“小公”,国家生产是“大公”,“小公”要服从“大公”。拟制兵工建设五年计划,他又谈到,“现在兵工厂的建设规模已经不小,不能冒进,其发展要与整个重工业的发展相结合”^{[4]281}。1956年编制“二五”计划时,他进一步指出,“现在把国防工业步子放慢,重点加强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把底子打好;另一方面,把原子弹、导弹、遥控装置、远程飞机搞起来,其他的可以少搞”,“只有这个办法,不然就徘徊歧路,东边走几步又回到西边走。把器材、资金统统集中搞国防工业,别的生产少了,人民的生活也不能改善,各方面紧张,而武器制造出来,仗又不打,炮不能吃,枪也不能吃,子弹生产多了还不利。所以非下决心不可”^{[3]236-237}。1962年,我国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军事压力,中央军委制定了“备战整军”方针,全军部队按战备要求进行整编,周恩来依然强调,“军队的调整要与国家的经济形势相适应。看来,国防工业要走到整个工业的前面是不行的”^{[1]425}。即使是在“文革”期间,他还是坚持“国防工业建设应该从小到大,不要一下子搞得太大”^{[1]556}。

其三,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相互结合。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坚持平战结合、军民结合、军民两用的原则,走集约高效发展之路,是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探索形成的战略思想。其中,周恩来对这个问题思考得比较早也比较深。1954年,他批示总后勤部关于军需工厂生产力过剩的报告:“我意,基本方针应是:将军需工厂精简到适合国防需要和保留一定比例储备的生产力的程度,其过剩者应移交给政府有关部门经营管理”^{[1]329}。这虽就军需工厂结构调整而言,但已蕴含着军事工业要为社会服务的重要思想。在1956年毛泽东表明“学两套本事,在军事工业中练习生产民用产品的本事,在民用工业中练习生产军事产品的本事”^{[5]306}的看法以后,第二机械工业部很快制定了“平战结合、军民结合、以军为主、寓军于民”的国防工业发展方针。周恩来在领导军工建设的实践中,不仅把“大规模的军民结合”具体解读为“民用工业在平时要有战时的准备,以便在一旦爆发的情况下就能够迅速地转到战争的轨道上来。军事工业在平时也要兼为经济建设服务,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能力,尽可能多生产一些民用产品”^{[1]500};而且不断深化自己的思考,据钱学森回忆,在一次研究“两弹”工作的专委会上,“周总理讲了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套东西将来也可以民用嘛!三峡工程就可以用这个。’我记

得很清楚,他这句话我很赞成。这就是指那套组织、指挥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生产的一套领导方法,可以应用并推广”^{[6]289-290}。显然,这种认识已经突破了军事工业生产民品、民用工业生产军品的“学两套本事”层面,进入到建设经验及模式相互借鉴、相互交融的更高境界。

二、在国防任务的需求牵引下开展军工建设,处理好应急备战和长期规划的关系

新中国的国防任务艰巨而又复杂。世界头号军事强国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长期威胁我国的安全、主权和领土完整。60年代与苏联交恶以后,我国又一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随着国家安全形势不断恶化,中央对于战争危险的估计也越来越严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包括军工生产在内的整个军事建设围绕备战而展开。如何处理应急备战和长期规划的关系,成为军工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周恩来主张,“一方面备战,一方面还要摸长期规划,要备战和长期规划相结合”^{[1]517}。备战与规划,从根本上说,都是由国防任务的需求所牵引,是相互联系的,而不是对立或割裂的。应急备战要有规划,无论形势多么紧张,即使在爆发了战争的特定条件下,也不能盲目行事,乱了阵脚;长期规划是为了更好地备战,虽然某些具体内容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而调整,但其具有科学性和稳定性,一旦确定下来,便不能随意取消。这二者结合在一起,才能兼顾现实和长远的双重需要,促进军工建设的更好发展和国防能力的有效提高。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周恩来一方面非常务实地主持决定兵工生产的方针“是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与加强国防的需要进行生产与逐步地改造生产,使之尽量地满足战争的要求与适合作战的要求”^{[1]196},强调“首先应使现有的人力、物力发挥应有效率,以便在这一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4]239}。另一方面,他在战争准备阶段,就卓有见地地要求各军种建设应预有计划,“如果今天订不出长远计划,也必须先订出一个短期的至少三年的建军计划,作为准备阶段的计划”^{[1]146}。1952年7月,他又以兵工委员会主任的名义向中央递交《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提出兵工要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规定18种枪炮为国家制式武器,比较细致地规划了下一步的军工建设^{[4]251}。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的相对和平阶段,人民解

放军向着“建设世界上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凯歌行进,周恩来更是强调积极地、有步骤地、考虑综合平衡地改善武器装备。例如,他讨论海军建设计划指出,“从我国造船工业可能发展速度、国家财政能力和即与苏联订有三年海军订货协定等情况出发”,“有计划地逐步地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1]331}。这一时期,他先后主持制定了多个军工建设规划,特别是本着“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1]185}的态度,明确了国防科研工作“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坚持不懈、戒骄戒躁”的方针,制定了史无前例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简称《十二年规划》),从投入资金、组织机构、主要项目、人才建设等各方面擘画蓝图,保证了军事工业和国防科技的飞速发展。

进入60年代,应急备战的气氛越来越浓。周恩来仍然力主军工建设的合理性计划性,尽己所能做了许多“降温”的工作。他曾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准备大打,准备快打,准备两面打,但战备工作的落实还要一步一步地来。我们的计划定了之后,不要因为一时的风吹草动,就天天变”^{[1]524}。周恩来多次具体指导军工建设,“第一要排队,第二要循序,第三是集中力量搞尖端”^{[1]427};“仗要一个一个地打,自力更生的实现要一个一个表现出来。想一下什么都行,这是没有分析的空想,是错误的。有些武器搞出来了,过不了技术关,也不能用,反而造成错觉”^{[1]430};实施大、小三线建设必须统筹安排,逐步实现,“不论是一线地区还是二线地区的建设,都要精心研究,统一规划,分别轻重缓急,根据资金设备、材料的可能,认真排队,逐步实施,保证搞一个,成一个”^{[1]491-492}。

三、坚持“两条腿走路”,处理好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的关系

20世纪50年代,在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的多次核讹诈,面对愈演愈烈的世界核军备竞赛,我们党坚定了发展自己的核事业、打破敌人核威胁的思想认识。毛泽东说过,“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1]387}。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完全一致,他综合考虑国防安全与和平建设的因素,深入剖析掌握原子能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我们才能有巩固的国防”,“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并坚信,“只要我们认真工作,我们是能够掌握原子能的”^{[1]369、357-358、359}。周恩来始终坚持发展国防尖端科技不动摇,为我国核

事业的酝酿、决策和发展而殚精竭虑。与此同时,他又总是以宽广视野考察整个军工建设,主张“尖端武器与常规武器并举”^{[1]421},二者不可偏废,做出了精到分析。

一是认为战争威胁的实际决定了必须“两条腿走路”。1961年,周恩来在国防工委北戴河工作会议上谈到,虽然核武器是打破敌人威胁的利器法宝,但军事斗争准备的主要还是常规战争,这种情况决定了我们“尖端要有。有了导弹、核武器,才能防止使用导弹、核武器;如果我们没有导弹,帝国主义就会使用导弹”,常规武器的发展也“要很快跟上去”^{[1]421}。翌年,他围绕“备战整军”再次强调,“今天打仗不仅在五年内而且在十年内我们还是打常规战争,作战计划要放在打常规战争上,但仍然要抓紧搞尖端”,“准备在今后十年中,把常规武器搞充足起来”^{[1]431}。1969年,对苏斗争形势极为紧张,“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已经明确,周恩来还是表示:“打起仗来,主要是靠常规武器”,要求常规武器的发展常抓不懈^{[7]280}。

二是认为科技发展的规律决定了必须“两条腿走路”。周恩来一贯认为,既要看到抓尖端可以带动常规;又要看到常规是尖端的基础,发展尖端犹如攀登科学的珠穆朗玛峰,如果不首先把常规搞得像个样子,则“基础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工作就是不到家”^{[1]431}。基于这样的认识,1961年,他在国防尖端科技发展的关键时刻,向中央建议组建国防工业办公室,“对常规武器、国防尖端科学研究、干部培训以及生产建设等工作进行统筹规划,全面安排,组织执行和督促检查;加强国防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防工业部门同其他有关工业部门之间、同各兵种之间的联系,并且组织互相协作配合。”^{[1]422}嗣后,新成立的国防工办直接归口管理二机部、三机部和国防科委所属单位的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是认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必须“两条腿走路”。新中国是一个刚刚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任务、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国。这一点,决定了我国尖端武器的发展目标只能是建立适度的核威慑力量体系,而不能脱离实际的单骑突进。1956年,周恩来就曾说过,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这个任务的实现是决定于东西的有无,不决定于是否有很高的产量。”^{[1]322}后来,他也多次表达,“在尖端武器发展上,我们要以质胜敌,数量不能太多,太多了反而背包袱”^{[7]280}。为此,周恩来对国防科技战线提出了“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

的组织纪律性”的“三高”要求和“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十六字方针。朱光亚曾经回忆,总理多少次谆谆教诲,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周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6]307}。

四、坚持“以我为主”,处理好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

周恩来向来主张,军工建设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自力更生为主,事关能否自己主宰命运的大问题。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就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即使对于苏联及各人民民主国家,我们也不能有依赖之心”,不能一切依赖外援,“倒在外国人怀里”^{[2]904}。新中国成立后,他反复强调,对于中国来说,自力更生具有战略意义,“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革命要靠自己,建设也要靠自己”^{[1]429}。

本着这样的认识,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的边打边建,到其后整建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体系,周恩来始终要求广大军工人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展建设。特别是发展核事业,在苏联援助我们的情况下,他未雨绸缪,指出“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6]318};当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央毅然做出继续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他更是明确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国内”的建设方针,提出“要、学、买、钻”四个字,指出:“不管要到、学到、买到与否或者多少,主要还靠自己钻研。自己不钻,不仅不能有独特的创造发明,而且也不能把要到、学到、买到的用于实际或有所发展”^{[8]1574}。领导国防科技战线做到了不乱阵脚,不受挟制,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最终完成“两弹一星”研制的既定任务。

努力争取外援,则关系到能否少走弯路,能否体现后发优势,降低研发成本,尽快改变军工建设的落后面貌。身兼军事、外交多重领导的周恩来,在新中国争取苏联军事援助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角色,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华的军工建设项目,大都经由他决策、争取最终落实下来的。翻阅新中国成立以来周恩来文稿不难发现,他就军工建设与苏方的往来文电比比皆是,足以为证。1954年9月,他借赫鲁晓夫访华之机,和苏联订立《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提升了苏联对华装备技术援助质量,苏方开始提供现役常规武器装备样品及制造技术,从而使我国从仿制苏式旧装备转向仿制苏式现役新装备。1957年,周恩来抓住国际形势变化、赫鲁晓夫对华军事援助限制松动的时机,领

导主持了与苏联在核技术援助方面的谈判工作,促成双方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根据该协定,苏联对华军事技术援助出现实质性突破,从帮助中国发展核工业延伸到核军事领域,对我国尖端武器发展助益良多。

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关于争取外援的思路开阔,并不局限于社会主义国家。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就说过,“我们要向敌人学习”^{[1]297}。1971年底,他出席航空产品质量座谈会,就进口国外先进技术产品的具体问题鲜明指出:不能认为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不好,它们也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能搞,要批判地学习外国的东西^{[7]501-502}。

以上辩证处理四对重要关系的真知灼见,仅就周恩来军工建设思想择要言之。此外,周恩来关于军工的生产与基建、质量与数量等关系也多有论述,提出了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基本建设、在质量保证的前提下扩大数量等论断。这些思想,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发挥了极大的现实指导作用。“一五”、“二五”计划中,国防工业均被列为重点,军工建设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有计划有步骤地调整布局分工,开展技术研究,淘汰陈旧装备,彻底改变军工厂小、散、乱及维修仿制和土法生产的落后状况,逐步实现从仿制到自行研制的历史性转变。至1959年,已建成兵器、航空、船舶、电子等大中型企业100多个,初步形成研究、设计、生产相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至70年代,又掌握了独立自主的战略核力量体系。短短20余年间,武器装备的原理、结构和性能发生了质的变化,杀伤力、机动力和防护力出现了断代性飞跃。这一军事奇迹的取得,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共同奋斗的结果,也极大地凝聚着一代伟人周恩来的心血、智慧和辛劳。

[责任编辑 周 峰]

参考文献:

- [1]周恩来军事文选: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 [2]周恩来传(三)[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 [3]周恩来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4]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 [5]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 [6]不尽的思念[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 [7]周恩来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下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